



马先彦
林芊◎著

当代贵州学术思想史

—— 哲学 · 史学 · 民族学 ——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马先彦
林芊◎著

◎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

当代贵州学术思想史

—— 哲学 · 史学 · 民族学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当代贵州学术思想史：哲学·史学·民族学 / 马先彦, 林芊著. --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3
（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
ISBN 978-7-81126-430-2

I. ①当… II. ①马… ②林…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贵州省—现代—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836号

当代贵州学术思想史

——哲学·史学·民族学

著 者：马先彦 林 芊
责任编辑：史达宁 廖 波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45千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6-430-2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851）6771143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环境变化与学术思想发展

第一节 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1
第二节 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	4

第二章 哲学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10
一、贵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轨迹	10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	1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41
第二节 中国哲学研究	52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	52
二、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65
第三节 贵州学的创构与实践	71

一、贵州学的创构及内涵	71
二、黔中王门研究	74
三、黔中佛学研究	80
第四节 佛教思想研究	83
一、贵州佛教研究概述	83
二、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	85
三、佛教史的研究	89
三、佛教人物传记及思想研究	96
四、佛教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	100
五、近二十年贵州佛教研究特点与未来展望	102

第三章 史学思潮研究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贵州史学研究	108
一、1949—1966年的史学思潮	108
二、“文革”前贵州史学研究成果	110
三、1966—1976年的史学思想	114
第二节 1976—1994年的史学思潮	116
一、中国史研究及其成果	116
二、世界史研究及其成果	125
三、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及其成果	128
第三节 走向21世纪的史学思潮	130
一、史学思潮的多元化与研究成果的创新	130
二、不断创新中的历史教育	137

第四章 民族学思想文化研究

第一节 民族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	139
第二节 民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142
一、20世纪50—60年代的成就	142
二、80—90年代的成就	145
第三节 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研究	153
一、民族学原理和理论	153
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	168
三、在民族问题理论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先后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	171
第四节 民族史研究	176
一、族源与迁徙研究	177
二、民族制度史	198
二、民族关系史研究	211
第五节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216
一、民族民俗文化研究	216
二、关注现实：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学术重点的转移	226
后 记	233

第一章 社会环境变化与学术思想发展

中外学术史表明，学术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主题和方向，学术研究的开展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条件，更离不开主导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制约。建国以来，贵州学术思想所关注的题域及其发展的方向，都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必然受到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一节 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主要是在国家体制的各种保障下进行的。因而，资金的投入不仅影响学术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持续能力。

解放后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五”期间，全省经济和文教卫生基本建设投资达3.38亿元。不断增长的财政投入促进了全省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首先，扩大了高校建设，新建了省级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这一时期尽管撤并了贵州大学，^[1]但对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从贵州大学另立出来的贵州农学院进行了改扩建，还创建了贵州民族学院。1956年高校专任教师达500多人。另外，1953年设立了贵州文史研究馆，1958年成立了贵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省委还建立了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其次，创办了不少

[1]1953年5月国家高等教育部下发《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据此，1953年撤销了贵州大学。

文艺、学术刊物，如1950年创办的《贵州教育》，1953年创办的《山花》，1958年创办的贵州省委理论刊物《团结》杂志以及贵州省委主办的《贵州通讯》。再次，凝聚培养了新中国贵州第一代学术研究队伍。研究人员分布在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党政宣传文化机构，他们在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8至1965年期间，贵州经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左倾”浮夸风等挫折，后经不断调整，逐步有所恢复。这一时期，全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跌入建省以来的最低点，经过4年的经济调整和恢复，1965年的农业生产才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这期间，虽然重建了贵州大学，又兴建了贵州工学院和中医学院，建设了一批科研机构，但因经济困难，影响了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1962年撤销了贵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创刊不久的《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及由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创办的贵州第一份史学期刊《贵州史学》也被迫停办。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进入萎缩阶段。

“文革”十年，贵州与全国一样，经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科学研究处于瘫痪状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贵州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持续增长，至1998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65.34亿元。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教文化事业进步提供了经济支持。教育事业费财政拨款由1976年的10206万元增加到1985年的38054万元。此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教育事业费也随之持续递增，到2000年已达50.35亿。另外，国家财政对高校建设和科技投入的力度也不断加大。1985年，省委决定，“七五”期间省财政要完成高校专项基建投资11030.37万元。此后的每个五年计划，财政均投入一亿元以上。2000年，全省高教科研经费1678.5万元，高校获得国家科研项目及留学资助经费413万元。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学术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省委决定建立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预算指标数为12万元；1979年改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在编人员110人；1984年，事业经费开支达到了80万元。^[1]1980年4月成立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4年，省社科联所属省级学术团体已发展到119个，到1999年，发展到124个，市、州、地社科联已发展

[1]《贵州省情（1949—198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9页。

到6个,全省共有10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1]

这一时期,直接对社会科学研究资金投入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课题经费的设立和投入。1983年2月15日新成立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到1987年,全省社会科学事业费支出达295.1万元。同时设立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983年为15万元,1984年增至30万元。从1986年开始设立研究课题并对课题给予补助。在省社科规划课题经费资助中,一般课题最高金额7000元,重点课题金额2—5万元。之后还设立了省长基金、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随着财政资助力度不断加强,至“十五”期间,省社科规划基金增加到每年70万元。省教育厅资助总额逐年递增,最高年度达30万。“十五”期间,省财政对高校社科研究专项经费每年拨款10万元。贵州社会科学院、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大学从事业费中划拨专项经费,补助优秀成果的出版及发表。各地州县也拨专款资助社科研究,如毕节市对彝族文献搜集、整理、汉译和出版给予了长期的财政资助,三都县用于“水书”文献研究的财政拨款2003年就达60万元,次年又追加13万元。

第二,科研奖励。从1987年开始,启动了全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到1992年进行了第二次评奖。此后评奖制度化,每三年一度进行评奖。到2002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全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定。对每一次评奖,都加大了政府奖励的幅度。同时,从1984年起开始对选拔出来的杰出学术人才给予荣誉称号并发放制度性政府特殊津贴。类别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4年起)^[2],贵州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1990年起)^[3]。相应的,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都出台了奖励措施。

第三,出版发行学术刊物。20世纪60、70年代,贵州社会科学理论期刊为数甚少,全国公开发行的、纯粹的学术期刊只有《贵州师范学院学报》一家。至80年代,先后有《贵州民族研究》、《贵州文史丛刊》、《贵州社会科学》、《贵州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创刊。此后,随着财政投入增大,社会科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发展和繁荣我省社会科学事业奋斗——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2][84]黔科干字第4号。

[3]省发[1990]25号文件。

学各类学术期刊相继问世，据1996年出版的《贵州出版志》统计，全省1990年发行出版的社科刊物已增至35种，至1994年底，仅社科联系统创办的刊物就发展到80多种。

不断增加的财政投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1983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展”展出各类科研成果1540余件，参观人数达到7000余人次。1996年到1999年，省社会科学各级学会组织召开的研讨会达340余次。^[1]从“六五”以来，全省仅社科规划确立的课题就达635项。一批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先后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和贵州大学建立。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第二节 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规定着贵州学术研究的中心内容及研究性质。在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语境的制约或影响下，我省社会科学研究同全国一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党和政府主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省委宣传部于1952年1月发出关于工农政治教育的决定和在职干部政治学习的指示，对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在运动中，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纷纷赋诗著文，抒发对新时代的憧憬，知名学者王佩芬写下了“扩充眼见前头望，行见花明万里春”的诗句。^[2]著名史学家张振佩也说：“解放前为生计而四方奔走，如‘乌鹊失栖常不定’，能专心著述教学，则自五十年代始”^[3]。许多学者明确了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决心以新的姿态规划自己的学术研究。史学家周春元在《新黔日报》上发表文章，畅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1] 贵州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贵州省社科联大事记（1980—2002年）》，第339页。

[2] 贵州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贵州师范大学学者风采》，2001年，第3页。

[3] 止善：《张振佩先生学行述略》，《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表示“以后一身治学，都贯彻此一方法宗旨”。^[1]在此学习运动中，理论工作者和高校研究人员还编写了一批理论辅导材料。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贵州理论工作者围绕这一中心，作了普及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等理论的工作，写出了一批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这一时期，也因左倾思想的影响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自1951年，思想领域中的运动不断，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学术研究的题域和方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1955年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由于将思想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以简单粗暴的批判斗争替代学术论争，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造成了消极影响。^[2]

1956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作的重点逐步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需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1957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八大”也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些政策提高了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热情。民族研究所组织对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编写了苗族、布依族及侗族的《民族史（志）》。1956年7月，有关部门制定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12年（1956—1967年）规划草案，贵阳师范学院拟定了《贵阳师范学院12年（1956—1967年）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选题》，标志着贵州的社会科学建设进入了有序化阶段。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开始系统搜集和整理贵州历史文献与史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也开始启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如张振佩的《石柳邓起义事迹考》^[3]，《对尚铨主编〈中国历史

[1] 贵州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贵州师范大学学者风采》，2001年，第3、123页。

[2] 这一时期贵州理论工作者学术成果的详情，参见本章第三章第一部分。

[3] 该文后与其他作者的研究成果，在1962年合编成《贵州苗族起义史话》一书，该书最后再经过修改增写，结成《清代贵州各民族五次大起义》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纲要>的一点意见》^[1]，候绍庄的《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之区别》^[2]，张汝舟的语言学著作《简明语法》，论文《再谈屈原的生卒》^[3]等。贵州文联通过《山花》编辑部组织“笔谈”，讨论“双百方针”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意义。著名作家蹇先艾等提出“无益的忧虑”，“拿出作品来竞争，更好地为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服务”的学术主张。《山花》刊载了《学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体会》^[4]等一批优秀论文。贵州的学术研究步入了良好的成长时期。但不久，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遭到了严重伤害。1957年5月3日，贵州所有高校先后开展整风运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参加人员共5792人，有306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是学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专家，如刘方岳、张汝舟等。1958年“大跃进”以来，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致使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进行。

八届九中全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调整。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4月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提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这些具有政策性的文件对“大跃进”以来，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对知识分子的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也作了一定的清理。1962年，贵州省政府批评了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错误行为，肯定了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各高校和研究单位分别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为刘方岳等一批知识分子摘去了“右派”帽子，为被扣“白旗”帽子的李淑元等老师进行了甄别改正。贵州大学党委号召开展学术研究，提出在学术讨论中“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

[1]张振佩执笔：《对尚铨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的一点意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2]候绍庄：《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之区别》，《光明日报》，1957年1月3日《史学》副刊。

[3]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1957年第5期。

[4]谭绍凯：《学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体会》，《山花》，1959年第3期。

棒子”的三不主义，并给教授、副教授配备科研助手。^[1]贵州学术思想领域又开始活跃起来，如文论界在《山花》杂志上纷纷撰文，论争“文艺大众化、民族化”，“关于无产阶级艺术标准”等学术问题；哲学界讨论了“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问题；贵阳师范学院各系共提出了89项科研课题。一批学术成果陆续问世，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明文选注》、《贵州史》（修订稿）、《贵州苗族起义史话》、贵州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集》撰成出版；李独清教授发表了研究贵州近代大儒郑珍的长篇论文《巢经巢诗论》^[2]；张汝舟发表了汉语研究的重要论文，并着手总结古代天文历法研究；《贵州史》的编写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经过在60年代的短暂“调整”，正常的学术研究又因“四清”、“五反”和政治思想领域的批判而受挫，并在随后的十年“文革”中全面停滞。文革十年，林彪、江青等人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文革前17年的学术成就。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打入另册，许多专家教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帽子，遭到残酷的批判斗争，“文革”十年造成了我国理论学术研究的大倒退。

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结束了十年“文革”。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告别了极左时期，在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与反思，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迎来了学术思想研究发展的最好时期。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3]广大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贵州学术界也出现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1982年贵州省委宣传部在地、州（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邀请了各高校和社会科学研

[1]《贵州大学校史（1942—1984年）》，第100页。

[2]李独清：《巢经巢诗论》，《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3]江泽民：《在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

究机构的理论工作者参会，并提出了45个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涵盖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科学门类，为科学的学术研究走上正轨铺开了道路。1983年2月15日，在省委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了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召开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从“六五”计划开始，对每个五年计划都进行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1987年，省委又提出了加强理论建设和推进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强调“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积极鼓励探索创新”。^[1]这些举措从制度化方面推动了贵州学术研究，为贵州学术思想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政策保障。90年代贵州社会科学研究先后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规划，如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贵州新文学大系”，“贵州民间文化研究”等。另一方面，学术研究领域有了开拓性的扩展，如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实践观哲学”等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引入，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发展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为新主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2]贵州的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有了可喜的发展，儒家思想、儒学发展史研究，宋明理学及流变研究等前沿论题，都备受贵州学者关注。在史学领域，不仅在传统史学问题研究中有不少创新，研究题域还扩大到文化史、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史也因借鉴了现代化理论与方法而有所突破。贵州逐渐形成了一支资源深厚和结构合理的研究梯队，各专业领域一批高素质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3]为全省学术研究的繁荣和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思想解放运动为学术研究开启了光明大道，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出版了各类著

[1]胡锦涛：《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接贵州九十年代的新发展——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如余正荣：《生态发展：争取人和生物圈的协同进化》，《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蔡永生：《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新探》，黎玉琴：《论开放与社会进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刘远明：《跳出科学共同体的圈套》，《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庄勇：《科学与人文：人类洞悉世界的两种方法》，《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龚妮丽：《论“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及人文意义》，《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需要注意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陶渝苏著《知识与方法》一书，则是科学哲学论域里研究的优秀成果。

[3]据《贵州省社科联大事记》，到1999年，全省有10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同年出版的《贵州省社会科学界专家名录》，介绍了省内专家201人。

作1000多部，署名发表各类文章25000篇。^[1]贵州社会科学院1978年至1998年间，完成了计划内科研项目300余项，发表论文、评论、译文等4426篇，出版著作275种，出版译著20余种。^[2]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型国学丛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50种，更是掀起了社会研究的热潮。而由政府主导编撰的新编地方志系列，以前所未有态势拓展了方志编纂与研究的规模。90年代以后贵州苗、布、侗、水、仡佬五个民族文化研究，贵州通史，王阳明心学研究等，它们都以丛书或多卷本的形式出版，这一系列成果展现了新时期贵州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气魄，并将贵州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1]《贵州社会科学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肖先治、蒋南华主编：《贵州社会科学院2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第二章 哲学学术思想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贵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轨迹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巨大变化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解决新旧思想的矛盾，解决如何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问题，树立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在这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迫切和十分必要的。这个要求表现在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部分前苏联学者介绍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的新版或再版方面，后者如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米丁编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习提纲》，奥则尔曼著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此时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为了广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除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有1950年12月29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同时发表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社论，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要求“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而把自己的工作的检讨与这个讨论联系起来”；1952年4月1日，又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概括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响应《人民日报》社论的要求，文

化界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动作起来，大力投入到学习和宣传“两论”的热潮之中。不少知名专家撰文以漫谈学习体会的形式，宣传“两论”的基本精神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先后撰写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等长文，艾思奇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都以通俗的方式为《实践论》作进一步的宣传。著名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也发表了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文章，指出《实践论》的贡献之一，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老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指导新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与此相应，贵州省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用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使之普及。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普及工作主要通过广播讲话、课本等通俗形式进行。贵州理论工作者编写出诸如《农业合作社政治课本》、《知识青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话》、《工人怎样学哲学》、《农民怎样学哲学》、《人民公社妇女政治教材》、《和农村干部谈谈矛盾问题》等宣传材料。其对象主要针对工人、农民、青年和干部群众，而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认识方面。这两大内容也体现在出版物上，前者如《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唯物主义讲稿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初步研究》；后者如涉及唯物辩证法解读的《哲学名词十六条》，《〈实践论〉名词解释》，《〈矛盾论〉名词解释》，《和农村干部谈谈矛盾问题》；涉及唯物主义认识论解读的《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等。另外，此时期的关注点还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问题，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等。上述各宣传材料和出版物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灌输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这些宣传和教育，提高了广大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帮助群众深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群众观、阶级观、国家观，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理解新中国的社会建设。

当然，在宣传过程中，贵州理论工作者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矛盾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当时国内理论界广